



文化与政治译丛
应奇 主编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

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美] 弗里茨·斯特恩 著
孟钟捷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9-1897

文化与政治译丛

应奇 主编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

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美] 弗里茨·斯特恩 著

孟钟捷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美)斯特恩著;孟钟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文化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100-10918-5

I. ①非… II. ①斯…②孟…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德国 IV. ①D7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0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与政治译丛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

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孟钟捷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18-5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 49.00 元

Fritz Stern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Copyright ©1992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rningside Edition

中译本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晨边版 1992 年版译出

文化与政治译丛

总 序

在自我流亡十六年，抵达新大陆八年之后的 1949 年，被誉为极具哲学天赋、但却毫无政治天分的汉娜·阿伦特给她终身的导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写信：“什么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① 就正如她所称颂的海德格尔思想中席卷的风暴并非起源于 20 世纪，而是来自于遥远的过去，对“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感同身受的阿伦特这句话的问题意识也远远地越出了所谓德国问题的语境，而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腊时代。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被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家称作政治哲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不管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也不管它遭到怎样的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都确实是古典希腊时代的真实写照。通过柏拉图的如椽巨笔，以苏格拉底之死而被戏剧性地问题化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就被抽象成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沉思与行动的对立所支撑起来的哲学框架是多维立体的，然而哲学与政治之对立的整个文化背景却大致是一元均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们把古典古代的世界称作异教世界。

如果说城邦的崩溃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动荡，那么基督教的兴起则直接导致了古典古代之文化一元性的终结；从“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到“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二

^① 见阿伦特于 1949 年 1 月 28 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转引自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第 161 页。

元区分是对于这种对立的最好也是最终的表述。到了这个阶段，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已经让位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文化之核心层面乃是一种与古代循环论截然不同的线性的和末世论的时间和历史观念。而随着与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的近代科学的兴起，随着科学日益成为近代文化的一种最具构成性和形塑性的力量，广义上的哲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具体内涵就落实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真正坐实了斯特劳斯所谓“科学与历史，当代世界的两大动力，在联手摧毁政治哲学这门学问上取得了成功”。^①

按照现代性的出生记，由进步观念护法的与古代世界的断裂本身就是正当性的一种标记。但是在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的过渡中，现代性本身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其动力则日趋衰竭，如罗伯特·皮平所言：“19世纪晚期的现代性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力再生产它自身，也没有能力使它本身具备正当性。”^②这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危机，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解释上的危机，而如果我们像皮平那样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这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在理解哲学与文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出现的危机。但是同时，其程度并不稍逊地，这种危机也出现在后现代性的国家和地区，只不过在后者这里，所谓文化的内涵除了在原发现代性内部固有的科学的维度，更增加了传统和本土的维度，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危机在这里乃具有双重的含义，而走出危机的尝试似乎就更有“毕其功于一役”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作为现代性之发祥地的近代西欧诸国中，德意志乃是一个

^① 参见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译文载于詹姆斯·A. 古尔德等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页。

后发国家,但比较巧合且深具范型意义的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属于欧洲落后国度的德国在哲学上却扮演着第一提琴手的角色,并一直享有文化之邦的令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问题成了史家眼中“整个近代史上最难解、最纠结和全局性的问题”,近代德国也就成了我们观察哲学、政治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最好场域。而用另一位史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话来说:“非政治的德国既是德国偏离西方及其持续的政治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①然而,在经历魏玛共和倾覆、纳粹帝国败亡、东西德的分裂和重新统一之后,德意志的国家建设却逐渐走在了理性、节制和健康的道路上;在用宪法爱国主义总结从波恩共和国到柏林共和国的经验时,经历了与形形色色的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所谓“决断论”和“机缘论”之毕生奋争的哈贝马斯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并着重强调了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和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之间的区分;如果说在德意志传统的文化政治论述中,看上去是静态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中的“政治物”和“文化”都是受到轻视和贬低的,那么“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则试图用一种形成政治文化的动态机制克服文化与政治之间固有的分离和对立,从而以这种方式超越和扬弃了贯穿魏玛前后的权力与文化之争、文明与文化之争、“好的德国”和“坏的德国”之争,提供了一条走出非政治的文化,从文化政治走向政治文化的路径。凡此种种,都无疑将为我们思考被称作德国问题之“翻版”的中国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承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谓“普遍奴隶制”之余绪,与希腊罗马的古典的古代形成对照的亚细亚的古代曾经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扮演了某种暧昧的角色,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主义内涵并没有被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主义彻底抽空,从而只具有历史

^① F. Ster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political German”, in: *History*, 3(1960), 转见于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pp. 314—315, Norton, 1967.

化石的作用。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曾经夫子自道其工作乃是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延长”，并分别用《尚书》中的“器惟求新，人惟求新”和“器惟求新，人惟求旧”把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刻画为古代社会的两种并行的进化路径——“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①的确，在《资本论》的准备稿中得到集中表述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论在保留和捍卫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冲动和雄心的同时，也为容纳和调和和社会发展各阶段和形态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概念空间。

无独有偶的是，我们竟然也能够从作为 20 世纪中叶蔚为大观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自我反省之产物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中辨认出上述“延长”的异域回响，只不过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发生了转换，而其概念内涵也早已今非昔比。从这种反省中所浮现出的文化现代性和规范现代性的视野去透视从中国近代的中西体用之争到晚近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争，哲学在文化与政治的二元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同于古典的古代，哲学处于与政治的某种直接对立的关系中，犹如“巨人之战”背景下真理与意见之抽象对峙；也与近代西方的情形不同，哲学与作为文化中最有力量的科学相互竞争，争夺空间，于焉衍生各种调和哲学与神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双重真理论。不同于亚细亚的古代，“哲学”具有牢笼万有的“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也与近世中国主流论述不同，仍然试图仰仗中国哲学中最为精髓的体用模式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哲学现在所要“争夺”的不再是一个“论域”的空间，就好像它有一个其他学门不能染指的独特“论域”，而是一个“概念空间”，这种“空间”尤其出现在各“论域”交叉重叠处，其作用即使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是具有弥漫渗透和贯通之功效的；哲学现在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35页。

“仲裁者”，而是一个居间的“调停者”，不再是一个即将一劳永逸地提出“仲裁”的外在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概念框架的内在参与者；更为关键的是，在追问其他领域的正当性标准的同时，它必须——如果不是事先——给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只不过在文化间的语境中，这一点似乎尤为显豁甚至“自明”，但也唯因在这种语境中，最为重要的就既不是“见树不见林”的“格义”，也不是“会当凌绝顶”的“判教”，更不是用“区分敌友”来“劫持”政治之内涵，而仍然是在“哲学突破”两千多年后哲人们依然孜孜以求的“内在超越”，也就是要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把轴心时代第一次区分开来的无限与有限、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承认它们之间概念区别之重要性的基础上，重新把它们统一起来。

在从“内在超越”的视角论及“应然的权威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这个问题时，哈贝马斯如是说：“‘道德视角’应当从世界内部对这个视角加以重建，把它纳入我们主体间共有的世界范围当中，而又不失去与整个世界保持距离的可能性以及全方位观察世界的普遍性。”^①而将近两百年前，黑格尔在谈到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时曾经说：“真正的拒绝必须是穿透了对方的力量，并且在他有实力的基础上与之遭遇；赢得胜利的途径并不是在某个别处向他进攻，在他不存在的地方把他打败。”^②至今看去，后面这句话既像是对我们仍然面临的真实处境的逼真写照，更像是对我们措置这种处境的智慧警示，于是愿以此语与“文化与政治译丛”的读者共勉。

应 奇

2014年4月，浙大紫金港

^①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② 转引自童世骏：《“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载于韩水法主编：《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译 序

—

本书作者弗里茨·理查德·奥斯卡·斯特恩(Fritz Richard Oskar Stern)是当代致力于德国历史研究的、最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不过,无论从其经历,还是从其论著而言,他的活动轨迹远远超越了这样一种单一“身份”(Identität^①)。

斯特恩本人便是一位对“身份”极为敏锐的思考者。他在自传式的历史专著《五个德国与一段人生:回忆录》(*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München, 2007)^②中,开门见山地强调了家乡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的市民“拥有着多重身份”:他们的祖辈或是波兰人,后来作为西里西亚人臣服于奥地利,说着自己的方言;19世纪发展成为普鲁士的第二大城市,建立起严格的官僚体制;1871年后升格为德意志人,演化为一种古老民族文化的继承者;这里生活着新教徒、天主教

① 在德语中,该词的意义颇为丰富,至少可以解释为:身份、认同和同一性。

② 英文版题为《我所知道的五个德国》(*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New York, 2006)。

徒和犹太教徒,但即便是犹太人也可根据来源或改宗与否被分为若干团体;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此处孕育着早期工人运动的种子,如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或德意志劳工领袖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①

这种“多重身份性”进而在斯特恩的一生经历中留下了烙印。首先,他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从祖父辈开始便已改宗基督新教,以至于他在1933年前都不知道自己身为犹太人的身份,而且此后即便致力于犹太史研究,他对犹太教本身仍然没有产生兴趣。^②其次,他是一位德国人,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日益严重时,迁居美国,然而其研究重心却仍然围绕着德国历史。再次,从其曾祖父一辈算起,至少有6位长辈从事医生职业,其他亲属也大多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而他却另辟蹊径,成为一位人文科学研究者。但即便如此,由于为爱因斯坦作传^③,他在50岁后成为声名鹊起的“科学史学家”。第四,作为历史学家,斯特恩向来重视档案研究,他为撰写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Gersén Bleichröder,1822—1893)与俾斯麦的合传^④,曾常年浸泡在巴黎与柏林两地的档案馆中,如侦探般寻找“金钱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不过,微观研究并未阻挡斯特恩对宏大叙事的理解、反驳、争辩与建构。在每一个被他解剖的“麻雀”背后,都隐藏着让人们叹为观止的问题意识,如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精神风貌、德国历史的延续性等。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斯特恩从来没有让自己局限在书斋中,

①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Übersetzt von Friedrich Griese, München: C. H. Beck, 2007, S. 21—25.

② 同上书, S. 133, 238.

③ 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 World*, Princeton/London, 1999. 该书颇为畅销,出过6种语言的译本,中文版题为《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方在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77.

他以一位“拥有责任心的观察者”(engagierter Beobachter)^①的身份名扬德美两国。作为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斯特恩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对德美两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警示,并致力于维护与发展德美关系。^②

如此色彩斑斓的人生和对复杂历史做出的敏锐而清晰的判断,让每一次对斯特恩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都不免如盲人摸象般,很难做到虑周藻密^③。在这一意义上,这篇译序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尝试。以下,译者将从斯特恩的生活世界、政治参与和学术创建三方面加以勾勒,进而对本书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导读。

二

尽管 20 世纪以来变幻无常的世界、大起大落的德意志国家和那个“拥有着多重身份”的故乡布雷斯劳是斯特恩从未想过挣脱、甚至不断投身于其中的“外部的”生活世界^④,但译者以为,斯

① 可参见一份访谈记录:“Der Historiker als engagierter Beobachter. Fritz Stern im Gespräch”,载于:Fritz Stern, *Der Westen im 20. Jahrhundert. Selbsterstörung, Wiederaufbau, Gefährdungen der Gegenwart*, Weimar, 2008, S. 124—136。

② 可参见 1996 年斯特恩 70 岁寿辰时,美国两大德国研究机构(德国历史研究所和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负责人的发言:Marion F. Deshmukh and Jerry Z. Muller (eds), *Fritz Stern at 70*, Washington, DC, 1997, pp. 11—15。

③ 到目前为止,斯特恩的自传以及若干访谈是理解其个人思想发展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把斯特恩及其思想视作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一篇,而且它是应景之作(即“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一员),主要讨论了斯特恩作为流亡美国的德裔历史学家这一层面上的身份特征与学术贡献。参见 Gangolf Hübinger, “Fritz Stern zwischen Europa und Amerika. Eine Fallstudie zum Geschichts-Intellektuellen”,载于:Peter Burschel, Alexander Gallus und Markus Völkel (Hrsg.), *Intellektuelle im Exil*,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11, S. 219—240。此外,值得参考的还有一些书评和斯特恩学生在其 70 岁寿辰时编著的文集。《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的译者曾有一小段对斯特恩的简介,但总体而言,中文学术界对斯特恩及其学术思想和贡献毫无了解。

④ 晚年的斯特恩有一次突然想起,在自己 7 岁和 12 岁时也曾想过离开德国。参见“Der Historiker als engagierter Beobachter. Fritz Stern im Gespräch”, S. 128。

特恩的“内部的”生活世界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主要同他的家族及其交际圈相关。

在斯特恩的回忆中,这个庞大的家族至少在布雷斯劳生活了四代人。他用典型的德国历史研究术语“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来概括这一家族的主要特征^①。在当代德国历史学界,这一术语指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一部分城市文化精英们的自我认知:他们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拥有一个固定且社会成就往往高于经济收入的职业,通常归属于基督新教,社会交际圈集中。当然,代际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斯特恩家族四代人的人生轨道恰巧反映了一百年间“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在不同时代精神下的奋斗与挣扎。

第一代人是所谓“1848—1849年革命”的支持者。他们在“统一与自由运动”的旗号下成长,把建立民族国家和推行自由主义视作并行不悖的二元目标。西格斯蒙德·阿什(Sigsismund Asch, 1825—1901)是这代人的杰出代表。他是斯特恩的曾外祖父,是唯一在斯特恩自传中得到详细描述的第一代人。1848年,他在获得医学博士后不久,便投身于布雷斯劳的革命运动,要求改革不公正的体制,解决贫困问题,推行10小时工作制。1863年后,他连续担任市议员长达16年之久,推动城市和卫生体制的建设。他的人生丰富多彩,以至于成为多出戏剧的创作题材。当他去世时,这座城市以“老阿什”的亲切昵称来安葬他。在斯特恩的另外三位曾祖长辈中,有两位是当地有名的医生,而且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②

第二代人是在所谓“建国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俾斯麦的统一大业让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政治问题不

^①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26.

^② 同上书, S. 28, 38.

再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所热衷的对象。斯特恩的祖父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 卒于1911年)和外祖父奥斯卡·布里格勒(Oskar Brieger, 卒于1914年)都没有追随父辈的政治足迹,而是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他们既是当地的名医,又先后进入大学担任教授,前者成为细菌学专家,后者开创了耳鼻喉科。两人的成功为家族带来了超越财富的莫大荣耀。小斯特恩名字中的“理查德”和“奥斯卡”便是为纪念两位祖辈而增添上的。与他们交往的人大多是科学界的佼佼者,如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 1868—1934)便是老斯特恩的莫逆之交,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以“你”相称。哈伯后来成为小斯特恩的教父,小斯特恩名字中的“弗里茨”正是来自于这位大化学家。祖父辈或者在成年后改宗基督新教,或者在精神上已经远离了犹太教,并且都让自己儿女在出生时接受洗礼。如果说“外在的”生活世界还存在影响的话,那么对于第二代斯特恩家族而言,德意志的命运大概便是最大的诱惑力。斯特恩没有暗示他的祖辈牵涉进任何扩张主义的宣传或行动中,但却告诉读者,他的外祖父布里格勒在一战开始后,不顾年高体弱,积极参军,而且还要求自己的儿女参加救护队。这种对于德意志国家的认同是当时许多犹太人(无论他们改宗与否)的共同选择。^①

第三代人经历了最多坎坷。他们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鼎盛期,一战爆发前后进入大学,走上社会时与魏玛民主的跌宕起伏不期而遇,艰难安稳下来后不得不面对纳粹政权的持续迫害,最后只能在异国他乡重建事业。这一代人大多仍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己任。斯特恩的父亲鲁道夫·斯特恩(Rudolf Stern, 1895—1962)曾参加西线战役,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家族中新一代名医,1930年晋升为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伯父奥托·斯特恩

^①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33—34, 40—41.

(Otto Stern, 1888—1869)是物理学家,194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参加过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母亲凯特·布里格勒(Käthe Brieger, 1894—1973)是当时少见的理学女博士,后致力于学前儿童教育研究,她所创立的数学教学法获得过爱因斯坦的肯定。他的一位舅舅是布雷斯劳大学的遗传学讲师。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是,这代人被生存困境与民主危机一步步地逼迫到政治左翼的阵营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朋友圈中略见一斑:这些朋友大多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者,也因此十分不幸地成为纳粹上台后的首批受难者。^①

1926年2月2日,斯特恩家族的第四代弗里茨·理查德·奥斯卡·斯特恩出生在布雷斯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正如斯特恩后来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他的童年色彩并不黯淡。父母逐渐走上正轨的事业为他带来了十分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在1931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父亲还购买了一座拥有七间卧室的公寓房。夏冬两季,他们全家都会去北欧海滨或巴黎度假。然而1933年1月30日纳粹夺权,蓦然打破了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节奏。斯特恩视之为自己萌发政治意识的起点之一。^②

1938年9月底,在“水晶之夜”爆发前夕,纳粹政权进一步排犹行动之前,斯特恩一家通过英国逃到了美国,从此定居在纽约,斯特恩家族在布雷斯劳的历史至此落下帷幕。

毫无疑问的是,斯特恩是一位好学生,在学习上一帆风顺。他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并获得了唯一一份前往曼哈顿私立高中就读的奖学金。1943年,他又凭借全额奖学

^①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46, 56—62, 73, 81, 88, 96, 103—105, 122, 170, 209, 219.

^② “A Conversation with Fritz Stern”, in: *Bulletin of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28, Spring 2001. (<http://www.ghi-dc.org/publications/ghipubs/bu/028/b28stern.html> 2012—12—08)

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194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5年后，他在同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①

与斯特恩家族行医的传统不同，斯特恩选择了历史学这门古老的人文科学作为毕生职业。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家族产生的“内在的”生活世界的影响已经渐行渐远。斯特恩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来体验自己的人生。在专业选择上，他甚至拒绝了爱因斯坦的建议——后者认为，“这很简单：医学是一种科学，历史不是。那么还是医学吧”——转而受到了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1907—2012)和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的影响。^②前者鼓励他将来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并最终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后者启示他关注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的悲观心理，而这成为他一生的研究对象。

1946年起，斯特恩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除1950—1951年间短暂转战康奈尔大学外，斯特恩在母校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6年荣退。期间，他是“塞特·洛”(Seth Low)历史教席教授，还短暂担任过大学教务长一职(1980—1983, 1987—1988)。此外，他在巴黎、柏林、慕尼黑、波恩、康茨坦茨等地大学被聘为客座教授。

在斯特恩作为大学教师和历史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中，政治和学术是两件极为重要而彼此扭结在一起的活动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是“政治与学术的斗争场所”^③，他从政治体悟中发现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又从学术发现中找到政治行动的指南针。以下，我们分别来谈论他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学术研究创见。

^① 斯特恩的求学经历参见 Marion F. Deshmukh and Jerry Z. Muller (eds), *Fritz Stern at 70*, S. 73.

^②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206—208.

^③ 同上书, S. 281.

三

斯特恩的政治热情究竟产生于何时,来自于何方?这恐怕是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在自传中,他提到了两个时间点:纳粹夺权和踏上美国土地。前者让他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进而在日益喧嚣的政治鼓动中感受到恐惧;后者使他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激动^①。但在新世纪的一次访谈中,斯特恩又不经意地提到了姐姐和父亲作为其政治意识萌发的源头:“我相信,她(姐姐)不问政治的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我个人的政治发展”,此外“父亲对政治是如此感兴趣,以至于让我也沉浸于其中”^②。

尽管存在着无法确定的早年记忆,但从1943年起,当斯特恩进入哥伦比亚学院学习后,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便更为真切起来。他参加了一个所谓“选举罗斯福为总统”的俱乐部,代表罗斯福一方出面辩论。他还同一位教师探讨“国际警察”的利弊得失,并定期在学校广播中担任政治新闻评论员,“我感到自己像个美国人”^③。不久,他在一次以“爱国主义”为题的辩论中获得银奖(金奖空缺)^④。

哥伦比亚大学为斯特恩的政治参与热情至少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来自于美国情报和决策机构的专业人士汇集于此,如曾经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亨利·L. 罗伯茨(Henry L. Roberts)、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 1918—1990)、费利克

①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152, 168.

② “Der Historiker als engagierter Beobachter. Fritz Stern im Gespräch”, S. 127.

③ Fritz Stern, *Fünf Deutschland und ein Leben. Erinnerungen*, S. 206, 207, 209.

④ Jacques Barzun, “Fritz Stern at Seventy”, in: Marion F. Deshmukh and Jerry Z. Muller (eds), *Fritz Stern at 70*, S. 59.